

# 一样的地震 不一样的精神

——评《中国的力量》

张耀铭

(《新华文摘》杂志社,北京 100706)

又是一年“5·12”,不尽沧桑之感。怆然回首,四年来中国出版界围绕普及防震救护知识、宣传英模事迹、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反映对口援建和心理重建、关注震区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推出了大量优质图书。其中由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院士主编的《中国的力量——从汶川与海地地震后 20 天看中国的制度、文化和精神》(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全书 328 千字,总 246 页,下引该书仅注页码)一书,显得尤为给力和厚重。阅读这本沉甸甸的书,我们看到了川大学者肩担道义、笔写春秋、为民请命的诉求。

这是一本纯正的学术书,全书分为上篇“力量的彰显”和下篇“力量的源泉”。作者对中国汶川与海地地震后 20 天政府与民众的反应进行了系统比较,并从制度、文化和历史轨迹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反思和总结。翔实的事例,可靠的数据,全球化的视角,体现了严谨的学术风格和知性的表达方式,这便剔去了说教,剔去了煽情,剔去了平庸,给读者以生命体验、情感温润和理性追寻。概括起来,本书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展现灾难中的民族精神是它的深刻主题。八级强震瞬间撕裂龙门山脉,在中国的“心腹之地”划开了一道深深的伤口。山崩地陷,楼垮房塌,道路阻断,无数人骨肉分离、生离死别,从此改变了人生的轨迹。自然灾害,是人类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必须面对的挑战。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挑战和应战中,文明才得以承续和发展。而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能否成功地应对挑战,战胜灾难,则往往是考验其精神、文化的试金石。《中国的力量》凸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所表现出的优秀民族精神。正如该书主编谢和平院士在“序言”中所写:“灾难不仅仅意味着伤痛,还意味着进步与发展。……尊重自然并不意味着人类只能在自然面前束手待毙。天地可以不仁,但圣人绝对不可以不仁。政府的使命在于为人民服务,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于以天下为己任,悲天悯人,居安思危,能够从灾难中总结经验,在逆境中增长智慧。”(第 2 页)

上篇“力量的彰显”用纪实性笔法首先回顾了汶川地震

后中国政府的反应:胡锦涛总书记在地震后 1 小时即发出救灾指示;地震后 1 小时 22 分钟,解放军总参谋部启动应急预案;地震后 2 小时,温家宝总理赶赴灾区并在飞机上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4 小时后,2900 名武警官兵抵达灾区;5 小时后,部队先遣指挥组已经进驻灾区;随后,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在温家宝总理的带领下迅速在灾区部署救灾工作,数十万解放军进入灾区。灾难激活了一个民族最强烈的情感,整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就被动员起来,救援物资从国内外源源不断地运往灾区。其次,从震后 20 天政府应急管理、国民经济动员能力、国家灾难危机传播管理能力等四个方面阐释了中国政府在大灾面前成功地引导和调动全国人民抗震救灾的行动和意愿。汶川早已不只是中国西南边陲一个小小的县城,它的符号与象征价值,已经跨越国界,具有世界意义。汶川地震,给世界开启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中国的能力、中国的信心、中国的坚强、中国的精神在大灾大难面前淋漓尽致地呈现在世界面前。难怪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奥斯汀·拉姆齐(Austin Ramzy)感慨写道“海地与中国:一样的地震不一样的故事”(第 234 页)。

地震发生后中国电视屏幕上经常出现的一个感人形象就是温家宝总理。书中引用了 2008 年 5 月 31 日《时代》周刊的一篇题为《中国的地震灾害控制》(China's Quake Damage Control)文章中的一段描述:“中国人民渐渐习惯了温家宝总理在灾区忙碌的身影不停地出现在电视画面上。他向来十分同情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疾苦,被认为是中国庞大行政机构的亲民形象代表。而温家宝总理在得知中国西部省份四川遭受强地震袭击后所做出的迅速回应更是让许多人惊讶。地震发生短短 90 分钟后,温总理就前往机场,于下午到达距离北京 1500 公里的四川首府成都。当晚,中国中央电视台开始滚动播放温总理在救灾现场的画面。他集合救灾队伍,在暴风雨中发布命令,研究地形图,甚至冒险深入废墟,鼓励那些被掩埋在碎石下的灾民,要他们多坚持一会儿,救援正在展开。”(第 88 页)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一言一行,通过当时公开、透明、全面、及时的新闻

媒体传播到每家每户,不光是带动了各级党和政府领导的责任意识,也感动着每一颗中国人的心。正是在这样的激励之下,我们看到中国人优秀的民族精神被充分调动起来。大勇无前、大爱无疆,多少可泣的壮举和人物情动天地。

在上篇第一章中读者会看到一个小标题:“一呼百应:中华民族的慷慨善举使世界为之动容”,下边是这样写的:“在汶川地震救援中,通过各级政府的社会动员和有效组织,大量的民间组织、自愿者和人民群众在参与抗震救灾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特有的优势。蕴含于普通民众内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感得到了升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抗震救灾、众志成城’,‘到灾区去’等等,成为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主义旋律”(第38页)。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休戚相关的优良传统,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官兵解民于倒悬、拯民于水火的神圣使命,中国知识分子心系天下、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中国普通百姓善良仁厚、急公好义的传统美德,都在这次抗震救灾的伟大壮举中得到体现,真正实现了党中央举全国之力战胜自然灾害的坚定决心。

二、“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是它的崭新视角。如果说上篇彰显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以充分发挥的国家和社会的救灾力量,那么下篇则是从经验和学术的角度追溯了这一力量的源泉所在,那就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中华文化的高度凝聚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选择。书中写到:“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国家在遭遇大灾难时,民族文化精神最能得到充分的展现。……作为具有强大力量的心理共同体,民族文化激励受难民族走出灾难的阴影,张扬灾后民族重建的心灵信念,以悲剧的力量和崇高的精神书写民族的尊严。”(第169页)这种文化精神既包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也包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和塑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当这种精神成为文化,当这种精神融入血脉,自然就有了战胜灾难的力量!这力量来自于:一个民族“大爱无疆、扶困济危”的德行,一个政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理念,一种制度“和谐稳定、团结奋进”的优势,一个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自信和力量。

书中的结论部分以“历史与现实的内在逻辑”为题,概括并突出了中国发展模式与道路的“中国经验”:“国家的主权与独立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是民族力量得以发挥的强大支撑”,“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应对各种灾难与危机的物质基础”,“有效的法治是民众生存、发展与尊严的基本保障”,“先进的民族文化是社会凝聚力的粘合剂”。通过与同样蒙受地震灾难的海地的对比,该书旨在“发现和珍视我们自身制度与文化中

那些宝贵的东西,那些平时熟视无睹、并不在意,而只有在危急时刻才能看到它的价值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执政为民的党和政府、繁荣稳定的经济力量和秉承数千年文化底蕴、富有爱心而又勇于奉献的全国人民”(第241页)。通过对接连发生在两个不同国家的两次重大地震灾难的对比,“中国经验”既让读者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持之以恒的精神脉络,也解开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欣欣向荣的政治密码,更坦承地向读者指出了我国政府应急管理方面还存在的一些问题:防灾减灾的防范措施还不完善,应急管理的预警系统还较薄弱,紧急避险和民众自救的训练机制还未普遍建立,应急资源的日常供给和管理机制还应强化,应急管理的法治体系还不健全(第42页)。作者试图用“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崭新视角,去解读“中国震撼”的奇迹,去解读“中国力量”的汇集,去总结中国社会的独特发展道路,这无疑提升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确实,“中国经验”不仅仅指“成就”,它也包括“教训”;它特别指一些因为中国的特定人口规模、社会结构、文化积淀特点而产生的新的发展规则;它不同于“中国模式”、“中国奇迹”等概念,它是开放的、包容的、没有定型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它尊重其他的经验选择(参见:李培林《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社会理论》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在视觉上提供了别样的观察点,在见解上引发了诸多启发性。

三、比较分析、整合研究是它的鲜明特色。细读全书,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有二:一是比较分析贯穿始终,通过比较分析,“我们知道中国曾经有过与海地相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历史,有过与海地相似的混乱与纷争,有过与海地相似的困惑与迷惘。之所以有今天的不同,是因为我们与海地在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第3页)二是尝试整合研究灾害,汶川地震冲击着传统灾害(或危机)的认识和管理,改变了中国应急管理的理念与组织架构,作为灾害社会科学研究,本书组织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学、法学、新闻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强调学科、理论、视角、方法上的整合,强调灾害研究的全灾种、全程性、综合性、关联性,以及本地与全球的结合,这与以往的研究存在明显差异。

总之,这是高等院校利用学科优势,集体攻关,解决重大课题的一次有益尝试。当然由于成书时间较短,书中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比如一些材料的引用和注释还不够详细、规范,一些来自海外报道的翻译文字还不够准确、顺畅。但瑕不掩瑜,本书仍不失为一部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关怀的力作,颇值得一读。